

法国移民政策与近五年华人移民

(法国)卡琳·杰拉西莫芙著 陈欣译

将来, 华人新移民将较之老移民更关注侨乡关系或中国与海外华人的关系。最近 20 年离开中国的华人构成为这种移民群体的组成部分, 他们的侨乡联系较之老移民更容易界定。与后者相比, 他们与中国的关系更密切: 家庭、朋友、华语、民族。所有这些因素造就了他们对中国的亲近感。在他们离开中国时, 他们保持着回归的真情实感以及维持与中国联系的殷切希望。

移民及其包涵的与祖籍国的关系始终反映着国家、主权、移民与移民政策等问题。在历史上, 特别是在亚洲, 许多事例表明: 侨乡关系可能由于中国与移居国的关系以及融合的内在问题等因素而获得发展或受到制约。最近 20 年移民的背景发生诸多变化。产业化国家——如我们法国——面临着经济衰退、融合外国移民的难题以及排外情绪等。为解决第一次石油危机, 它们试图关闭边境, 使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更形困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新的华人移民获得发展, 他们还维持着与中国的侨乡联系。

本文旨在考察移民立法对华人移民与其故国关系的重要性。首先阐明法国华人社群及新移民的形象; 其次探讨法国最近的移民立法及华人新移民的反应; 最后考察将华人新移民与中国关系包括在法国协作发展规划政策阐明的官方架构之内的可能性。

一 法国的华人社群

华人在法国的存在 可以追溯到 20 世

纪初。在 1975 年东南亚华裔抵达法国前, 这个社群为数不多, 默默无闻。在这些难民之后, 华人移民接踵而至, 他们在法国构成小规模华人社群。华人社群主要由 7 种方言群组成, 其中最重要的是: 温州-青田、广州、潮州、华北。

1911 年的人口普查显示, 法国有 238 个华人。从 1900 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这个小社群在社会经济和职业构成方面颇具多样性。各种职业应有尽有: 留学生、知识分子、记者、外交官、贸易商、餐馆主、江湖医生以及在迪普的丝织厂和巴黎的酱油厂工作的劳工。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进展, 这个社群发生了变化。大战期间劳工的短缺促使法国政府招募了 14 万名华工。他们绝大多数来自华北。大战结束后, 2000~4000 华人留居法国, 从而构成法国华人社群的基础。1920 年代, 约 2000 名勤工俭学的留学生加入其中。大约从这个时期到 1940 年代, 浙江移民在法国日益增多。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共产党在中国的崛起遏制了中国大陆的移民。但是, 华人移民并没有完全停止。华人移民基本上来自原法属印度支那。1970 年代这些国家冲突迭起, 华人移民纷纷从这些国家涌入法国。1970 年代末 1980 年代初, 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华人亦移入法国。1980 年法国华人人口估计为 15 万至 20 万人, 他们基本上是贸易商、店主、餐馆主、工匠(木工或皮革工)和成衣工。

这个社群与中国的联系通过两个途径：家庭联系和访华意愿。第一类华人的一般形象是：他们大部分生于中国，亲朋好友主要在中国，他们是在1974年后抵达法国的。第二类华人即在中国以外出生的华人，同样希望维持与祖籍国的关系。一般而言，他们希望访问中国。这类人老幼不齐，他们甚至不会讲华语，但与法国其他华人保持着联系。这两个群体与海外华人——无论居住在世界任何地方——保持着联系（家庭的、经济的、文化的）。

从1980年代初开始，新的华人移民抵达法国。首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派遣的留学生，其次是某些家庭的移动（妻子与丈夫团聚、父母与子女团聚、兄弟姐妹团聚），再次是另一种日趋重要的移动：非法劳工。这些人一般年轻力壮（18~23岁），他们主要来自浙江省温州市。他们的情况可以分为两种：富裕家庭送到法国以便拥有“生活经历”的青年以及逃避经济困难（失业和低工资）的青年。这两种人的共同理想是在海外发财致富，“像其他华侨那样披金戴银回国”。第三个移民群体人数较少，他们是近年在法国出现的年轻的违法者。

这些人来到了法国，但法国从1970年代末实施了限制性移民政策（关于法国的立法细节见第二部分）。如同欧洲其他产业化国家和美国，法国在相当大程度上减少了签证配额。中华人民共和国属于签证配额较少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必须尊重所有限制性移民政策，它不轻易批准公民出国。在这种形势下，许多新华人被迫以非法方式离开中国进入法国。华人非法移民大部分通过相同的途径进入法国：通过俄罗斯和东欧。其他人选择南欧通道：在非洲之旅后通过意大利或西班牙进入法国。最近，一名年轻华人妇女在接受电视采访时披露了她和朋友的艰难旅程：在从莫斯科到德国的火车上，他们受到监视；他们跳下火车，在蛇头安排藏身

的德切基（Tchekie）某地的一间小屋藏了两个月。这些移民可能遭遇另一种危险：被其他华人——通常是犯罪团伙——绑架，他们或他们的亲属被迫为其付赎金。非法到法国的费用高昂，需8~12万法郎，这笔钱借自亲属或朋友。这样抵达法国的移民，首先必须为偿还旅费而工作。

华人社群里存在着两种网络：家族网络和犯罪网络。在家族网络中，法国华人开设商家（如服装厂），从中国的家族成员或同乡朋友中招聘员工。而在犯罪网络中，则是名副其实的的人口交易。蛇头将付钱者从一个国家偷运到另一个国家。这两种网络都是组织严密的。1997年，法国当局成功破获了多个网络。这类网络在法国的数量日益增长，因为迄至1998年对人口交易缺少严厉的惩罚措施。对此类犯罪，新的立法规定5~10年监禁。这些非法移民加入合法进入法国而未获准延长居留证的华人中间。另一个非法留居法国的新华人群体，是法国政府拒绝承认其难民身份的人。

他们非法进入法国或未获批准而留居法国，主要以黑市方式（clandestine way）从事工作。他们为剥削成性的老板工作，老板则不举报他们。一对温州年青夫妻在一家地下服装加工厂工作了5年多，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条件好时月薪可达1万法郎，反之则不足2000法郎。1980年代制造业赢利丰厚，但如今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导致利润和工资的极度下降。另一方面，法国政府针对地下工厂和作坊采取日益严峻的措施。非法留居法国的华人移民时刻面临警察的盘查、逮捕、递送出境。事实上华人移民目前由于法国政府宽容的态度而获益良多：1997年仅182个华人被驱逐出境。尽管困难重重，华人选择回国者依然为数不多。偿还债务、面临的难题和发财的意愿，这些是他们身陷困境而依然留居法国的主要原因。

近10年这些条件甚至变得更为严峻：从

1990年代初以签署者内务部长的名字命名的两项立法——巴斯克法案和德布雷法案——严格限制入境和滞留法国的条件。1997年执政的新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修订这些法案，但政策的精神依然如旧：关闭新移民特别是劳工入境的大门，展开反对非法移民的斗争。这些状况招致华人社群的反对，他们要求考虑他们的事业及其侨乡联系，让他们留居法国。

二 法国的移民立法与华人移民

法国的移民立法是以1945年的旧法案为基础的。¹⁰此后，多次对这项法案进行修订。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详述这些修正案，而是阐明近10年最重要的变化。第一项巴斯克法案(Pasqua legislation)1986年实施，它重新确立了驱逐的程序，限制更新十年居留证的可能性，引进驱逐“威胁公共秩序”者的概念，使驱逐年轻的违法者变得更为容易。与此同时，法国政府决定重新确立面向所有非欧共体国家的入境签证制度。1989~1993年，1945年法案几次进行修正：1991年12月31日加重对协助移民非法进入法国领土或以相同方式留居法国的个人或团体的惩罚；1992年2月26日确立对将没有合法证件(护照或签证)者运送到法国的人的惩罚；1992年7月6日批准法国政府将未获许可的外国避难者扣压在机场或港口20天以等待内务部确认其情况。¹¹1993年8月，第二项帕斯卡法案再次提高法国的移民条件。首先，它使驱逐非法移民更为容易；其次，它通过拒绝发放长期居留证，防止更多的移民——他们合法地住在法国——延长居留时间。这项法案使外国人的子女、留学生、法国公民的外国丈夫或妻子更难于获得10年期的居留证。于是，法国政府处理政治避难者事务的权力增大了。¹²如果市长认为某法国公民与外国人的婚姻似乎是移民的桥梁，市长有权阻止这种婚姻。移民与家庭成员的团聚条

件受到限制，家庭成员的团聚在移民客居2年——而不是1年——之前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保险部门应邀参与核查政策管理部门的居留证索引，以打击没有合法证件者。这项法案再次为1993年8月10日的法案所强化，后者使街头身份检查更为容易。

第二项帕斯卡法案的机制导致“愚蠢的”后果：首先，许多合法进入法国的移民突然变为非法留居者，“没有证件”，¹³因为获准延长居留的条件变化了。许多在法国工作、养家糊口、子女生于法国的外国人发现其处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另一方面，这些外国人又不能被驱逐出境，或者因为他们是法国籍儿童的父母，或者因为他们已与法国公民结婚。尽管如此，他们已然成为“黑户”！这些法案及其导致的限制性机制遭到反对党、社会团体以及大部分法国人的猛烈谴责。¹⁴在1996年总统竞选中，众多“没有证件者”举行示威。他们占据圣波那德教堂，开始绝食斗争。最后，政府决定用武力将他们驱逐出教堂。这导致法国人的强烈反应，从而促使政府重新考虑这些人的某些状况。1997年，以新任内务部长德布雷(Debre)命名的新法案只批准极其少数的移民申请证件。

这些对入境和留居法国的限制性法案再次为针对黑市工作(clandestine work)的立法所强化。1997年公布的这项法令加重对雇佣没有合法证件移民的雇主或未向有关当局申报的就职者的惩罚。如果说黑市工作影响移民以外的其他人，它主要是反映在这类活动中。¹⁵法国政府为将这两项法案付诸实施，再次强化干预措施和高压管理，如建立打击非法移民和黑市工作的特别力量(DICLEC和OCR IEST)。

下面列举两个例子，说明这些立法对最近抵达法国的华人移民的影响及他们的反应：

第一个例子是关于1997年11月110个

华人移民抵达新卡勒多尼亚 (New Caledonia, 位于太平洋地区)。¹⁶ 11月4日华人船民抵达鲁米亚 (Noumea), 法国当局要求他们留在船上并宣布该地区为“军事管制区”。后来他们被带到鲁米亚的一个特殊的中心。我们不得不说这些人没有在恰当的时机抵达。法国政府与新卡勒多尼亚正在讨论这个国家的新地位问题, 寻求给予其独立的政治方案。当华人在鲁米亚上岸时, 当地人谴责法国政府建立了使他们成为少数民族的地下网络! 除了这些“特殊的反应”, 饶有趣味的是法国当局决定采取严厉措施, 不让这些华人居住在法国的领地。这110个华人被留在军事管制区, 长达4个月。此后法国政府代表宣布: 这些要求政治避难的移民实际上是出于经济原因而离开中国, 解决问题的方案是将他们遣返回国。中国政府表示同意并决定派飞机前往迎接。¹⁷ 面对这种判决, 华人移民决定举行抗议, 他们占领屋顶, 直至警察诉诸武力控制他们。这次法国政府的反应令法国人大为震惊, 他们强烈反对刚选举产生的政府。在抗议面前, 法国政府改变主意, 停止了驱逐令。最后华人移民前往当地政府 (Canak), 正式要求准许他们留居新卡勒多尼亚, 当地首脑最终接受了这一要求。¹⁸ 这个事件表明法国政府对新移民的政策日益强硬。

面对这种恶劣的接受条件, 那些成功进入法国的人只能在恶劣的条件下居住和工作, 如果他们能够工作。偿还债务、养家糊口, 这些必要性导致法国华人移民反对法国的新法律。这种反应令法国政府惊讶, 因为此前华人社群曾以“沉默的社群”而闻名,¹⁹ 自从1996年夏第一次“无证件者”声援运动以来, 华人日趋积极地抗议法国的移民法律。

所有参与抗议运动的移民都要求获准延长证件期限, 轻松地在法国工作和生活。如我们所知, 他们的行动包括和平占据公共场所、绝食……。1996年8月17日, 法国政府

通过新的“无证件”法案, 恰如其命名所示, 第三类人再次涉及的主要是土耳其人和华人。第二类人则是多数民族。“我们是居住在没有围墙的监狱里”, 陈小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工作, 住房。我们随时会遭到偷窃——被其他华人, 被法国人, 被土耳其人。所有这些只有一个理由: 我们没有任何合法的证件。这就够了。”²⁰ 法国政府被迫重新考虑这些华人的处境, 他们中一部分人获得证件。但并非所有人及其活动都是针对法国新的社会党政府, 社会党政府已对法国移民立法进行新的改革。

1997年5月反对党社会党在立法选举后上台执政, 若斯潘政府以比较支持移民而闻名。然而, 尽管改变了帕斯卡和德布雷法案, 但他们的移民政策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限制新入境者, 反对非法移民。当然, 以齐夫内蒙 (Chevenement) 命名的新法案试图减缓对某些移民类别的严厉限制。²¹

新政府对移民事务的政策采取两种方式: 其一是在消除旧法律造成的“无证件者”过程中的大规模规则化运动; 其二是对1945年法令的新改革。1997年6月22日公布的法律文件界定了获得合法证件的条件。法国政府在一周内发放2000多份申请表,²² 其中中华人数可观。在这个星期, 许多华人出现在巴黎的中国领事馆前, 申请证明其身份、婚姻日期的官方文件, 或翻译法国规则化申请表要求的文件。面对突如其来的堵塞, 巴黎该区区长被迫开放一个公共体育馆收容这些人。他们人数达300多人, 来自法国各地, 但其中也有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²³

在“私生活和家庭”的情况下, 获得一年居留证是比较容易的。正是在这种类别中, 许多华人获得规则化。规则化运动的对象包括: 家庭团聚 (指某人非法地与其在法国的家庭成员团聚)、一个子女生于法国的父母、与法国社会 (朋友、工作) 保持密切关系和能够证明合法地延长在法国居留时期的外国

人。对于非法入境的未婚者而言则是困难重重，因为他们首先必须证明，在他们滞留期间内有6个月是获得法律许可并从事正常活动的。²⁴

1997年底规则化运动结束。各种持不同意见的团体呼吁给予所有“无证件者”以合法身份并举行抗议活动，因为许多人被迫再次进入地下生活状态。在抗议活动中，不乏华人的参与。这年夏初三类“无证件”者占据巴黎的一所教堂，开始绝食斗争。他们要求法国当局重新审议被规则化运动拒之门外的案件。最初法国政府予以拒绝，谴责持不同意见的组织“从事支持地下网络的活动”。²⁵与此同时，内务部、特别警察署突然发表声明，声称华人非法的网络、移民和工作与日俱增。但这一切对终止绝食斗争无济于事。绝食者之一是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年龄已经63岁。在这种严峻的局势下，法国政府决定先设立特别委员会重新审议这些人的案件，²⁶并按见其代表。²⁷同时内务部请求各部门放宽获得规则化的某些标准。相关的标准之一是提供工作证明。非法移民主要是在非法行业或以黑市方式从事合法活动，因此比较难于获得此类证明。法国政府宣布唯一的条件是在合法行业——这意味着公开的行业——工作，这使他们较容易获得工作证明。²⁸7月底完成对这些包括华人在内的人的申请的重新审议，答复是：在这群无证件者提供的46份申请中，33份获批准（合法居留证）；10份被否决，因为“他们的情况不符合任何规则化条件”；最后3份需要进一步材料。这些决定并不被绝食者所欢迎。他们感到被政府出卖了，并向记者表示将继续他们的行动。²⁹

法国华人移民面临如此困难的生活条件，甚至无法安心地工作。他们离开中国的目标是赚足够的钱还清债和寄回家，但实际是处于或者进行反抗或者另选他国的困境。³⁰

面对这种在欧洲其他国家亦无两样的局势，只能寻求其他途径开发移民工程以及移民与祖籍国的关系。这是法国移民政策的另一方面，它在将来不仅涉及华人移民，而且还在更具官方色彩的层次上、更具体地涉及侨乡联系的发展。

三 法国移民政策与侨乡联系的发展

新政府在其移民政策中增加其他两项重要内容：其一是选择性的开放边境政策；其二是包括移民的协作发展计划。这两项内容均可应用于比较好的“移民工程”。

法国政府制定一项记录以衡量近10年移民政策的影响。这种政策的最坏后果之一是法国的国际形象，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形象，被玷污了。法国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她在世界上的文化和政治影响力。对于各种外国人来说，法国变成难于进入的国家，甚至商人也不例外。面对这种恶果，新政府决定采取类似于美国或加拿大的政策，这意味着遴选可以进入法国领土的人。在这种遴选中，新政府决定制定特别临时居留证，来法国学习深造或从事研究和教学的学生、研究员和大学教师将很容易获得这种居留证。另一方面，这种政策还需要改革法国的签证政策。1998年6月法国驻世界各地外交代表处都接到新指令：在发放签证时给予商人、学生、艺术家、研究人员等以较好的待遇。向这些类别的人发放长期签证将变得比较容易。³¹

法国政策第二项饶有趣味之处是为发展而利用移民，这更具体地涉及回归政策。法国政府设置了一个由该工程的倡导者萨米尔·内尔（Samir Nair）领导的特别管理委员会。为发展而利用移民的思想由来已久。³²在法国这种思想最初于1980年正式被政府部门吸收进一项合作政策中。它建议在移民过程中开发离岸国和到岸国的共同利益，而且

还将移民视为移植资金和技术的发展载体。一些人认为这种思想存在某种排斥移民的方式，他们谴责这种政策是伪善。³³另一方面，在这种思想中毕竟还可以看到某种联系移民与发展的方式。法国的移民工程的目标是促进“移民在法国的融合，同时支持与移民原籍国的稳固联系，在长期过程中寻求维持潜在的移民故乡的方式”。³⁴法国政府建议运用的手段主要是向移民经营的大工程提供财政支援，培训特殊领域的管理人员。法国政府草案是根据若干关于移民过程的思想，当然可以进行讨论。这项工程意味着法国边境的可渗透性：当移民不能轻松地从祖籍国抵达目标国时，他们最终决定长期滞留在第二国，从而增加了融合的难题和移民的压力。法国政府希望与移出国谈判“协作发展和移民协定”（conventions on co-development migration）。这些协定将不仅涉及国家，而且还涉及省市政府、公司、专业组织、大学、学会等等。通过这种协定，法国政府将负责接待协定数量的劳工、受训者、学生，给予他们适当的培训，而祖籍国则负责接待这些人回国，安排工作，帮助创业。他们在回祖籍国后将获得“长期可续签的自由往返签证”。

协作发展政策将有助于向某些移民创建和管理的工程提供财政支援。法国政府已将这种政策付诸实验，特别是在塞内加尔和马里。³⁵它的基础是如下见解，即：移民较之任何人更清楚他们的乡村和城镇需要什么，他们较之任何外国人更能够在他们的故乡采纳和运营某种计划。法国希望寻求其他伙伴以发展这种合作关系。关于华人侨乡联系的实验，法国设想与华人移民及其故乡发展这种协作合作并不是完全不切实际的。这种思想的关键之一是这种政策造成离岸国与到岸国对侨乡联系的双重控制。许多移民将予以拒绝，因为他们希望如其所愿地自由行动。但另一方面，在移居国恶劣的背景下，移民的非法性质将在许多方面限制侨乡联系的发

展：如果移民生活在非法状态下，家庭联系、汇款、投资项目等将无从方便地获得发展。在这种草案中，必须在帮助侨乡联系与尽可能保持他们自由之间寻求某种平衡。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必需给予移民以重大自由并协助发展海外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同时使移民愉快地发展侨乡联系。如今问题在于移民抵达的国家。笔者认为如果能够运用他们提供的途径发展移民与其故乡的联系，则必须加以运用。

（译者系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注释：

本文是关于这个问题的初步探讨，将来将进一步深入。

华人社群是著名专家的研究领域。关于法国华人的历史发展主要引用廖遇常优秀的博士论文《法国的华人移民——移民、社会经济、社会实践》（Live Yu-Sion, "La Diaspora chinoise en France Immigration, Activité socio-économiques, pratiques socio-culturelles", Paris, These de Scocio logie, Ecoles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 Sociales, 1991, 824pages）。廖遇常发表了许多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他还在彭轲主编的《欧洲的华人》（Gregor Benton, Frank Pieke, ed., The Chinese in Europe, London, MacMillan, 1997, 408pages）用英文阐述了他的研究情况。关于法国的华人社群，参见Michelle Gullon, Isabelle Taboada Leonetti, "Le triangle de Choisy. Un quartier chinois à Paris", Paris, L'Hamattan, CIEM I, 1986, 210pages; Eric Venturini, Dominique Vidal, "Portraits de China Town. Le ghetto imaginaire", Paris, Autrement Editions, 1987, 189 pages; Jaqueline Costa-Lascoux, Yu-Sion Live, "Paris-XIII Lumieres d'Asie", Paris, Autrement, 1995, 167 pages

P. Wou, "Les travailleurs chinois et la grande guerre", Paris, Pedone, 1939, 36 pages; Yu-Sion Live, "Les traivelleurs chinois et l'effort

- de la Grande Gurre”, *Hommes et Migration*, no. 1448, nov. 1991, pp. 1- 14
- Nora Wang, “Paris-Shanghai, Débat d'idées et pratiques sociales, les intellectuels progressistes chinois 1920 - 1925”, Paris, State Ph. D. in History, University of Paris VIII, 1986, Vol 2, 1156 pages
- Veronique Poisson, “La population chinoise originaire du Zhejiang en France”, *Approches Asie*, No. 15, 1997, pp. 226- 233; Veronique Poisson, “Les Chinois du Zhejiang en France”, *Migrations Sociétés* vol 9, no. 54, novembre-décembre 1997, pp. 43- 60
- 新的文献尚在就这个问题进行探讨,但目前基本上是由新闻记者进行的。“Wenzhou-Paris La Longue marche des clandestins”, *Libération*, 04/09/1993; “Les Clandestins, chinois dans le colimateur”, *Le Parisien*, 06/06/1993; “La communauté asiatique rompt le silence”, *Le Parisien*, 27/07/1994
- Jean-Luc Porquet, “Les Clandestins, Enquêtes et France, en Chine et au Mali”, Paris, Flammarion, 1997, 403 pages
- 我运用的最近资讯源自关于移民问题的两个电视报道, Wang Fanghui, “Chinois-Le piège français”, TV Report; “Le droit de Savoir” Channel 1, Diffused 17/02/1998; Patrick de Carolis, “Clandestins”, TV Report, “Hors Séries”, Channel 3, Diffused 10/02/1998
- “Immigration: La police libère trois Chinois séquestrés à Paris par des compatriotes”, *Le Monde*, 25 décembre 1993, p. 10
- Thilbault de Maillard, Eric de Lavarene, “Clandestins Chinois La filière Wenzhou”, *Le Monde Magazine*, Mars 1998, pp. 31- 35
- Emmanuel Maunig, “Logiques du travail clandestin en France”, in Solange Montagne, ed., “Espace et travail clandestin”, Paris, Masson, *Recherches en Géographie*, 1991, 156 pages, pp. 99- 106
- 10 关于法国移民政策的优秀论述见 Patrick Weil, “La France et ses étrangers”, Paris, Folio, Coll Actuel, 1991, 592 pages
- 11 F. Crepeau, “Frontières du droit, frontières des droits L'introuvable statut de la zone internationale”, Paris, L'Harmattan, 1993
- 12 Luc Legoux, “La crise de l'asile politique en France”, Paris, CEPED, 1995
- 13 这是法国传媒给予的姓名。Didier Fassin,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à l'épreuve des sans-papiers”, *Revue M*, Janvier-février 1997, p. 39; A. Morice, D. Fassin, C. Quiminal, ed., “Les lois de l'inhospitalité Les politiques de l'immigration à l'épreuve des sans-papiers”, Paris, La Découverte, Coll Essais, 1997, 295 pages
- 14 Monique Chemillier-Gendreau, “L'injustifiable Les politiques françaises de l'immigration”, Paris, Bayard ed., Coll Sociétés, 1998, 284, pages
- 15 正如其他地方似的,法国许多人工作于没有纳税的不公开部门。Claude-Valentin Marie, “A quo sert l'emploi des étrangers”, in A. Morice, D. Fassin, C. Quiminal, ed., “Les lois de l'inhospitalité Les politiques de l'immigration à l'épreuve des sans-papiers”, op. cit., pp. 145- 175; A. Morice, “Quand la lutte contre l'emploi illégal cache les progrès de la précarité légale”, *ibidem*, pp. 177- 196
- 16 J-L Saux, “Les réfugiés chinois de Nouméa embarrassent le gouvernement”, *Le Monde*, 15 - 16/03/1998, p. 7; N. Herzberg, “Le salut des Boat People de Nouméa”, *Le Monde*, 11/04/1998, p. 12
- 17 F. Madoeuf, “Revoilà imminente de la plupart des 110 Boat People chinois de Nouméa”, *Le Monde*, 23/03/1998
- 18 F. Madoeuf, “Les Boat People chinois ont été accueillis par des familles de Nouvelle Calédonie”, *Le Monde*, 28/03/1998
- 19 N. Herzberg, “La communauté chinoise dans le mouvement des sans papiers”, *Le Monde*, 31/10/1998, p. 10
- 20 N. Herzberg, “La communauté chinoise dans le mouvement des sans papiers”, *Le Monde*, 31/10/1998, p. 10

- 21 Christian Bruschi, "Premier regard sur le texte de la loi Chevènement relatif à l'entrée et au séjour des étrangers en France", *Migrations Sociétés* Vol 10, No. 57, mai-juin 1998, pp. 49-59.
- 22 Bernard, N. Herzberg, "La régularisation des sans papiers suscite un afflux de demandes", *Le Monde*, 18/07/1998, p. 7.
- 23 "Affluence au consulat de Chine à Issy-les Moulinaux", *Ibidem*.
- 24 GISTI, "Qui peut-être régularise par la loi Chevènement", Paris, GISTI Publication, 1998, 32 pages.
- 25 N. Herzberg, "Lionel Jospin déclare: Notre politique n'est pas de régulariser tous les sans papiers", *Le Monde*, 07/07/1998, p. 30.
- 26 Bernard, N. Herzberg, "Le gouvernement crée une commission pour examiner les dossiers des sans-papiers", *Le Monde*, 03/07/1998.
- 27 Bernard, N. Herzberg, "Les sans-papiers des Batignolles cessent leur grève de la faim", *Le Monde*, 18/07/1998, p. 5.
- 28 N. Herzberg, "Le gouvernement assouplit cinq critères de régularisation des étrangers", *Le Monde*, 16-17/08/1998, p. 6.
- 29 "Les sans-papiers qui ont arrêté leur grève de la faim se sentent trahis", *Migrations Europe*, septembre, 1998.
- 30 N. Herzberg, "La France est devenue un pays rebond pour les clandestins", *Le Monde*, 20/08/1998, p. 8.
- 31 N. Herzberg, "La France inaugure une nouvelle politique des visas", *Le Monde*, 26/06/1998, p. 8.
- 32 参见OCDE撰写的著作和报告: OCDE, "L'incidence des migrations internationales sur les pays en développement", Paris, OCDE Pub., 1989, 459 pages; OCDE,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A new cooperation for development", Paris, OCDE, 1994, 343 pages.
- 33 早在1970年代末,某些作者已经谴责这类工程是工业化国家用以“剥削”第三世界工人的手段,第三世界的工人是被这些国家的公司请来工作的,而现在却被要求离开这些国家。B. Kayser, "L'échange inégal des ressources humaines: Migrations, Croissance et Crise en Europe", In *Revue Tiers Monde*, No. spécial: "Migrations et développement", Tome XV III, No. 69, janvier-mars 1997, pp. 7-20.
- 34 Bernard, "Le rapport Nair propose de mettre l'immigration au service du développement", *Le Monde*, 10/01/1998, p. 9.
- 35 Samir Nair, "La fuite des élites est la forme nouvelle du pillage du Tiers Monde", interviewed by Bernard for *Le Monde*, 05/05/1998, p. 14.